

中国帝王孝纪

王建钧 编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帝王孝纪

王建钧 编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帝王孝纪 / 王建钧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 - 7 - 215 - 11791 - 4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孝 - 传统文化 - 中国 - 通俗读物②帝王 - 生平事迹 - 中国 - 古代 - 通俗读物
IV. ①B823.1 - 49②K827 =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4533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65788065)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47.5

字数 660 千字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0 元

序

骆承烈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孝是教育人的开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出发点，是社会和谐的基石。无论从生态伦理、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各方面来看，孝总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孝文化从来都是一座赫然屹立、光彩夺目的丰碑。

在孔子指导下曾子作的《孝经》，将人类与生俱来朴实的孝行提升为孝道。书中对孝的定位准确、目的明确，执行具体、层次清楚、奖罚分明，成为倡孝的经典之作。此书出现不久，便被汉朝皇帝定为国策，令全国各地举“孝廉”，授予官职。日后又不断沿袭、发展为我国历代传承不衰的重要美德。

孝，作为人类社会中永恒的主题，为历朝历代、各地人民出自内心地奉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与历代朝廷强调及最高当权者提倡也大有关系。中国人从来都主张言出行随、知行合一，榜样的力量、行为的展示是无声的命令，历代帝王孝亲的事迹正起到这样的作用。尽管有的帝王孝亲是做做样子，好让百姓们尽忠尽孝，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但也不排除他们出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对父母、对先人的尊敬、恭敬、孝敬之心。在他们多次颁布的诏令律例中，对历代孝文化的提倡与弘扬，对孝道无疑起到推动作用。

本世纪以来，在国人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中，各地已开始重视起孝文化的研究与推广。从国家老龄办到各个省、市、县（区），到处成立起弘扬孝文化的组织。学者们到处作孝文化的学术报告，孝子孝女们现身说法，全国及各地陆续评选出孝亲敬老楷模：孝子、孝女、孝媳、孝星，用文字、图像出版各种宣传孝文化的读物，用现代媒体电视、电影形象地播映古今孝的楷模、孝的故事，都说明孝文化已引起全国人民应有的重视。

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河南省，在孝文化的推广上已走在全国前列，河南孝文化学者王建钧先生，秉承其父遗志，先后编写《中国帝王传》和《中华孝德故事》等书籍，尤其是《中华孝德故事》一版再版，在全国孝文化研究与推广中已成为佼佼者。现又在此基础上，抓住一点深入探讨，查阅大量资料，历经数年，新著《中国帝王孝纪》一书，从“五帝”之一的舜到历代帝王中选取大量孝亲敬祖的资料，据史正书，并加以通俗叙述，无疑是抓住孝文化推行的关键，对深入研究我国古代的孝文化，在新时代借鉴古人创立社会主义新孝道以及对孝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均起到重要作用。

这是一本严肃的历史书，是一本通俗的道德教育读本，也是一本与时代脉搏相合，我国当今社会日益老龄化特别需要的书。世界上的老年人亚洲最多，亚洲的老年人中国最多。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协调稳定，经济繁荣发展，全国人民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寿命越来越长，据统计，我国每天有两万五千人进入老年人行列。我们的党和政府不断出台一些惠及老年人的政策，正应了两千多年前孔子所说“政之善者，使民富且寿”的预言。老年人多了，需要养老，老年公寓只能容纳百分之五六，大量老人在家养老或社区养老。老年人在生活上的供应、精神上的慰藉都与子女的孝敬有关，深入研究孝文化，普及孝文化，用具体实例宣传孝文化，正是时代之必需、人们之急需，建钧先生这部大

作正是与时俱进的一项善举。善莫大焉！

二〇一八年一月于孔子故里

（作者系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委员会委员 中国孝文化促进会
特邀专家 曲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前 言

早在1995年，家父王芸廷先生编著的《中国帝王传》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作为该书副主编，承担了该书的统稿、校对、勘误及帝王事件的考证等工作，也就是在整理此书的过程中，使我对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优秀帝王在推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这些帝王崇儒兴教、以孝治国的作为由衷感佩。

2006年4月，家父因病仙逝。辞世前，他把多年收集的从古至今孝德故事初稿交给我，并嘱咐我要把这部书稿整理出来，让更多人读到它。我接过重担，感觉压力很大，因为她是父亲人生的最后一部书稿，也是他对美好社会的最后期望。对此，我有责任把这一使命完成好。安葬父亲之后，我用了四年时间整理书稿，并取名《中华孝德故事》，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目前，该书已经多次再版，在河南乃至全国，甚或研究孝道文化的专家学者当中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正是在整理、校勘、增补这本书内容的过程中，我开始更多地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并由此改变了我的学习、研究取向。

从2006年到如今十二个年头里，我探索孝的发轫，寻求孝的根源，探求孝道在历朝历代的传承发展，还把自己的心得和感悟写成文字，分享给更多的读者，我还在高校和一些国学讲堂，开设《孝文化发展史》《孝和中国》《孝道文化与和谐社会》《与大学生谈孝亲敬老》等选修课或讲座……在此传播、分享、再学

习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孝作为一种纯自然的伦理道德，除了她的人性和温情使万千家庭和宗法制社会变得有温度之外，她在进入有阶级的社会后，逐步演变成了一条人人必须恪守的铁律，甚至有时变成了一种政治工具，让其在历史进程中发挥力量，左右社会。而主宰这一变数的就是历朝历代的帝王。

不可否认，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得到行政力量的加持才能推行和传承，孝文化固然如此。历史在不断地嬗变，孝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其中历朝历代帝王所拥有的行政力量的推动，其作用是明显而巨大的。这些帝王，他们不仅自己践行孝道，同时在治国理政中，能够尊儒兴教，擎起孝道大旗，治国安邦，对当时的政治以及后来的社会都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于是，我决定取父亲《中国帝王传》和《中华孝德故事》两部著作“帝王”和“孝德”之和，从历史典籍中寻求历代帝王的孝行故事和推行的孝政，编写一本弘扬孝道文化的通俗读物，让读者进一步了解儒家文化的发展历史，也认知一下这些帝王们在推动中国根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便是我编写这本书的初衷。

初衷甫定，我开始大量收集和查阅古代有关孝行和孝政的资料，发现了大量记载孝行故事的典籍。

一是从《史记》以下历朝历代的正史中均有孝友、孝义或孝子的记载，大量纪录了孝子孝女的孝顺故事。从西汉开始就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孝子，《史记》《汉书》皆有记录，《后汉书·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专记诸位孝子事迹。但设体裁和章节对孝子进行专载为《晋书》首创，专设《孝友传》，并配有序跋。设《孝友传》的还有《旧唐书》《新唐书》《金史》《元史》等。《宋书》《齐书》《南史》《周书》《隋书》《宋史》《明史》《清史稿》设为《孝义传》，《梁书》《陈书》《北史》有《孝行传》，《魏书》有《孝感传》，《新五代史》有《一行传》，《辽史》有《卓行传》，《新元史》有《笃行传》

等，总共记载的孝子孝女数可以用万计。还有众多的《通志》《县志》等地方史记，也都记录了许许多多孝行故事。这些孝子孝女在正史中能够占据一定位置，是对他们在历史进步中所起重大作用的肯定和认可。

二是诸多辅助类文史书籍也有大量孝行人物的记载。如《东观汉记》《搜神记》《世说新语》《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大唐新语》《唐语林》《唐会要》等，也都记载了众多的孝子故事，与正史互为表里，甚至较正史更深入地探究了由孝子故事所反映的孝道伦理，对孝文化发展影响深远。

三是专门为孝子立传的通俗读物大量出现。这些通俗读物的出现始自西汉，有据可查的应是生活在汉元帝、汉成帝时期的经学家、文学家刘向编写的《孝子传》。因为《孝经》传到此，由于它地位很高，理论深奥，向不识字或识字较少的民众进行普及有困难，为更好地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百姓了解孝子、孝女以及孝道历史、道理、典型和故事，于是，一些用通俗文字甚至配上图画记载孝子故事的书籍便开始流行，刘向的《孝子传》就成了历史上第一部孝道通俗读物。虽然该书已经佚失，无从查阅，但它对后世编写孝道故事以教百姓的做法有了启迪作用。以后便有了更多专门为孝子立传的书籍，如晋代陶潜、萧广济、师觉授、徐广等分别都著有《孝子传》，唐代武则天时的《孝女传》一直到近代陈镜伊的《孝史》等，都集中展示了普通百姓中孝子孝女尊亲敬老的品行和风采。其他记载平民孝行的还有清代茆泮林的《古孝子传》、刘青莲的《古今孝友录》、李文耕的《古今孝友录》、李元青的《诸史孝友录》等。

不过，这些史书或传记中记载的大多是普通人或者是一些官宦人家的孝行，涉及帝王之孝并不多。到了元明清时期，才出现孝道故事书中有关帝王的内容，代表作就是《二十四孝》，全名《全相二十四孝诗选集》，后来有人配上图画，故又称《二十四

孝图》。该书有两篇帝王孝行故事，一是首篇《孝感动天》中的虞舜故事，二是次篇汉文帝刘恒的《亲尝汤药》。虞舜和刘恒的孝行故事最早被司马迁记载在《史记》“帝王本纪”中，但只是部分内容，专门为帝王孝道故事作传又加诗赞的书籍始自元朝郭居敬。这本书虽然只有二十四孝，但它辑录了天子、诸侯、孔门弟子、官员、一般平民的孝行故事，实际上回应了《孝经》中的“五等”人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并以此作为坐标，让每位读者都找到自己的定位，解读自己的孝心孝行。从此，专列古人各群体孝行故事的书籍层出不穷，典型的有明成祖朱棣时期的十卷本《孝顺事实》、明代郭正中的二十四卷本《孝友传》、钱尚衡的十卷本《孝史》、黄齐贤的十卷本《孝史类编》、清代康熙年间的一百卷《孝经衍义》、胡文炳《二百四十孝图》、黄小坪的《百孝图记》、俞诚甫的《百孝图》、胡虎臣的《二百四十孝》、张之洞的《白话百孝图》等，均涉及有帝王之孝，但都收录帝王不多，最多的是《孝经衍义》，用五十五卷记录了“天子之孝”，分爱亲和敬亲两子目，又有早谕教、均慈爱、效友恭、亲九族、体臣工等衍爱亲之义十二子目，事天地、法祖宗、隆郊配、重学校、崇圣学等衍敬亲之义十四子目，涉及具有孝行孝德的天子有30位之多。其次是《孝史类编》，该书以“承欢养志类”“竭力奉养类”“辞荣奉养类”“尽心侍疾类”“亲亡哀慕类”等二十二个门类编著，将“历代帝王孝纪”冠以第一卷之首，记录了帝王孝行。除此以外，其余书籍只是将帝王圣贤之孝置于开篇，多是寥寥数篇而已。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孝道文化迅速成为了文化界和学术界研究的一大新课题，有关孝道文化的专著和学术论文可谓是汗牛充栋，内容之广泛，篇目之众多，成就之突出，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如林安弘的《儒家孝道思想研究》、宁业高等人的《中国孝文化漫谈》、官晓卫的《孝经·人伦的

至理》、高成鸷的《中国尊老文化》、肖群忠的《孝与中国文化》、康学伟《先秦孝道研究》、高望之的《儒家孝道》、王长坤的《先秦儒家孝道研究》、朱翔非的《新孝道》、季庆阳的《孝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李宝库的《一颗闪耀着人伦之光的璀璨明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孝文化丛书》等等，都对帝王孝行孝政有较多的记载和较深的论述，正视和肯定了帝王在孝文化发展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尤其是曲阜师范大学骆承烈教授近几年主编的十二卷《中国孝文化研究集成》，其中《〈孝经〉序跋题识》和《历代孝行类编》之“兴孝篇”“正孝篇”中对帝王之孝均有介绍，特别是《历代孝亲敬老诏令律例》（上下卷）更是收录了所有帝王围绕孝道所颁布的诏书、敕令、法律条文以及帝王孝论。该“集成”可谓是孝文化集大成之作，也代表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孝道文化研究的最高成就。这套“集成”成了我编写帝王孝事丰富的食粮，甚至在很多地方我直接采用了骆教授辑录的内容和翻译的成果，为此书的完成注入了丰富的内容和营养。

在吸纳这些专家学者研究帝王之孝的养料的同时，我也渐渐发现在帝王身上存在着许多与孝道伦理密切相关的一些定律：

第一，帝王孝行孝政是推动历史健康发展的内动力。依据有四：

首先，无序社会到制度社会的转变依据的是孝道。早在人类进化的初期，其社会秩序可谓是无序的，但到了末期的父系氏族时期，开始出现有序标志，这就是一夫一妻制的萌生和随之家庭的出现，家庭有了，夫妻、父子、兄弟姐妹的关系开始确立，父对子女的慈爱以及子女对家长回报的过程中，孝便由此产生。小家如此，大家也如此，整个由不同的千万个家庭形成的宗法制氏族社会同样如此。这个家庭中的男人、整个氏族社会的首领对于家庭、家族的形成，对于父慈子孝的维系是起了大作用的，换句

话说，正是这些家长、首领在推动家庭、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内动力，让整个社会逐步由无序变得有序。人文始祖伏羲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个出生于西部成纪（今甘肃天水）的部落首领，在由西向东迁徙、而后定都中原腹地宛丘（今河南淮阳）的历程中，从他“正姓氏，制嫁娶”的功勋中，从创造龙的形象作为天子旌旗团结九州的伟大创举中，我们都可以清晰看到，这个人类史上最早的帝王正是由于创造了家庭的文明，让孝道有了生长的根基，才形成了一种内动的发展力量，在推动历史健康前行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到了“三皇五帝”末期的尧舜时期，正如孟子所言：“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也就是说，他们作为孝道精神的化身，在推动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方面，是起了极大作用的。随之而后的夏禹商汤、周文武王，哪一个不是擎起孝道的大旗，为社会的滚滚向前凝聚推力的呢？

其次，制度社会的不断进化靠帝王的孝道精神作推手。夏启立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的宗法社会，也就是中国开始进入了制度社会。制度社会的不断进化，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又到封建制的不断完善，靠的是优秀的文化和逐步健全的制度。这些优秀文化和不断健全的制度中有着太多的孝道内涵，从《尚书》记载的典章制序、西周制定的礼乐制度、西汉初期确立的“三老五更”体制、汉武帝推行的“举孝廉”国策、隋文帝初设的科举制度等重大事项中，都可以看出正是这些优秀帝王的推动，才使这些体现着孝道精神的重大事件得以出现或发生，因此，可以说，制度社会的不断进化与帝王的崇儒倡孝有着密切关系，或者说帝王身上的孝道精神是历史前进的推手。

再次，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始终充斥着孝道内涵。一个朝代最能体现帝王意志的是法律制度，从西周“不孝不友”要“刑兹无赦”，到《孝经》中“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再到南朝《齐律》、隋朝《开皇律》、唐朝《武德律》《贞观律》

《唐律疏议》、宋元明清的法律以及皇帝本人颁布的诏书、敕令、制诰等，都饱含着倡孝和律孝的内容，这些体现着帝王意识的孝诏孝律，对于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起到了明显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最后，封建社会反复嬗变，但孝道是秩序的主题。三国两晋南北朝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代，历经30多个国家和政权，时间跨度近400年，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魏晋〕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位，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也就是说，魏晋虽然改朝换代频繁，杀伐征战不断，但“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始终没有动摇，这个时期对《孝经》的研究和传播，无论是参与的对象（包含从帝王、太子到一般儒生），还是成果的数量（仅注释《孝经》书籍就达100余种），都是我国《孝经》研究史上最活跃、成效最为突出的时期。再如，元朝统治者作为马背民族入主中原后，一开始并不重视孝道，但随着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蒙古族尊祖敬宗的传统很快与儒家文化中的孝思想相融合，再加上统治人民的需要，践行孝道便很快提到了人人必须遵守的高度，成为治理国家、重建社会秩序的主题。尤其是第四代皇帝元仁宗恢复科举制，更是对儒家思想的高度认可和回归。至于清朝，虽也是少数民族乾定中原，但统治者推行孝文化的力度以及孝治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均达到了顶峰。由此可见，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无论如何变更，孝道作为统治文化，始终没有改变。这不能不说，孝道作为一颗闪耀着人伦之光的明珠（李宝库语），在历朝历代明君的尊崇下，始终放射着熠熠光辉。正如曾国藩所描述的那样，“读尽天下书，无非一孝字”，巍巍中华史，一部孝道史，足可见儒家思想的不朽、孝文化的深入人心和明君治理国家的根本。

第二，开国皇帝若推行以孝治国，整个王朝国基稳定。

汉朝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天下”的王朝，刘邦作为开国皇帝，践行孝道，率先垂范，不仅自己把平民父亲尊为太上皇，而且治理国家开启了诏选贤良的先河。其子汉文帝刘恒、其孙汉景帝刘启在其基础上不断完善诏举贤才制度，最后由其重孙汉武帝刘彻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举孝廉标准，完善了察举制度。两汉时期，都在竭力维护和不断完善这种制度，使大汉江山持续了四百年之久而不衰。唐朝在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创立下，确立以孝治国的国策，国基稳定，强劲发展，整个有唐一朝都在践行儒家思想，弘扬尊老敬老风尚，以孝律人，取得了近300年的国祚昌盛。明代和清代分别在“孝子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治乱世用重典，治盛世用孝行”和康熙大帝“孝为万事之纲”的理念下，各立国将近300年，让孝道发展进入了成熟时期，也是政治和经济诸方面出现鼎盛的时代。这些成就的取得皆归功于以孝治国的推行，道德建设的力量。

第三，凡是仁孝皇帝，大都能取得盛世之治。

另一条社会发展的定律是，凡是仁爱皇帝，在其治下，大都能够取得盛治之誉。汉文帝和汉景帝是历史上有名的孝顺父子，他们共同创造的“文景之治”开启了后世创建盛世的先河。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宋仁宗的“庆历、嘉祐之治”、明太祖的“洪武之治”、明成祖的“永乐盛世”、康熙乾隆的“康乾盛世”等等，无一不是因德治而兴，靠孝道而成。就连东汉的“明章之治”、唐宣宗的“大中之治”、宋孝宗的“乾祐之治”、辽圣宗的“太平之治”、金世宗的“大定之治”、明孝宗的“弘治中兴”等等，无不打上了孝治的痕迹，均是这些帝王用仁孝治国的直接成就。尤以宋仁宗的“仁孝治国”为典型案例。他把“仁孝”两个字诠释到了极致，在他42年的统治生涯中，他以天性仁孝、宽厚和善施政于他的时代，虽然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功绩，也没有痛快淋漓的霸气，但他留下的是

一个富裕繁华的大宋，亲政30年，免征百姓几十亿贯，宁苦自己也不愿苦百姓，更没有让宋朝卷入太大的战争，他的时代可谓上海晏河清，时和岁丰，国家富强民主，人民安居乐业，仅从像包拯、狄青、韩琦、柳永、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司马光、黄庭坚等一大批知名人物出现和四大发明其中三个产生于该时代就足以证明，这是一个文化繁荣、科技发达、人民幸福指数至高的盛世，而出现这样的盛世与宋仁宗的仁孝治国密不可分。

第四，仁孝帝王的背后大都有一个贤良的母后或皇后。

西周之前的太王古公亶父、周王季历、文王姬昌是三位仁孝之主，而身后的太姜、太任、太姒皆以德行著称，在历史上合称“三太”，她们端正严谨，庄重诚敬，旦夕勤劳，以尽妇道，可以说周朝能有八百年基业，与这三位女性对自己孩子的美好教育分不开，她们三位可以说是历史上贤良淑德的女性代表，是妇女德行的好榜样。西汉初年的汉文帝之母薄太后一生与世无争，善良谦让，与民亲近，教子有方，才培养了对母至孝和心怀天下的千古孝帝。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皇后阴丽华，与丈夫历经乱世别离，待皇朝建立，屈身为妾，位正中官后，又善待废后郭氏及族人，被史书赞为“性仁孝，多矜慈”“友爱天至”，其子刘庄继位后，作为皇太后，又帮助儿子册立开国功臣马援的小女儿为皇后，这位马皇后对婆母孝顺，对丈夫恩爱，对儿女友善，对外家严格，崇尚节俭，知书达理，后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典范贤后。就是在这样的和睦健康的家庭里，让东汉初期的政治舞台上连续走出了刘秀、刘庄和刘烜三代英明皇帝，同时，刘庄和刘烜又接力创造了“明章之治”，对整个东汉都影响深远。东汉一朝，女主之盛，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极为罕见。《二十四史》中，对后妃的记载都是“后妃列传”，唯有东汉一朝，是“皇后本纪”，足见东汉初期仁孝皇帝对后妃的重大影响，也可见他们

背后的贤后对国家的运转所起的极大作用。

第五，朝代之间的仁孝传播都是一脉相承的。

西周的礼乐制度和充满仁孝精神的宗法制观念对西汉立国影响至深，西周的“孝为政本”和“三老制”“王杖制”等尊老制度，在汉朝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最终形成了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局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文帝刘恒是历史上对母至孝的典范，他的母亲因是姬妾，按照汉朝礼制，却无法追尊为皇后，一直被史书称为文帝太后，或薄姬、薄太后。可到了重拾以孝治国的东汉立国后，刘秀下诏曰：“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贤明临国，子孙赖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配食地只。”刘秀对高祖母的追尊，凸显汉文帝的仁孝是可以隔代相传的。东汉末年，曹操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却对汉献帝刘协仁义以待，不仅让他衣食丰裕，还为他重新捡回了天子的威严，并进献自己的三个女儿为御妻。曹操去世后，曹丕代汉称帝，封刘协为山阳公，不仅没有处斩或者流放，而且还允许刘协在所封郡地奉汉正朔和服色，建汉宗庙以奉汉祀。曹丕还告诉刘协说：“天下的好东西，我可以跟你一起享受。”曹丕去世后，曹叡继位，刘协54岁时寿终正寝，曹叡率群臣亲自哭祭，以汉天子礼仪葬其于禅陵，并谥为孝献皇帝。仁孝帝王的义举为自己的后代造福积德。魏国历经五帝后走向灭亡，末帝曹奂被取而代之的晋国开国皇帝司马炎封为陈留王。司马炎深感曹丕和曹叡对汉朝末帝刘协的善待，所以，这位晋武帝不仅封曹奂为王，而且诏令食邑万户，给予他使用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行魏国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仿效魏国初期的制度、上书不称臣、受诏不下拜的待遇。其地位、待遇、结局可以说是历代亡国之君中最好的。曹奂58岁逝世，也可谓寿终正寝。这种因果关系绝不是偶然的，它是道德力量的感染，仁孝精神的传承。

第六，以孝治国的朝代，大都学术思想活跃、文化成就突

出。

汉朝是第一个“以孝治天下”的朝代，随之而来的是经学的崛起和文化的繁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孔安国《古文尚书》《古文孝经》，贾谊的《新书》，毛亨、毛萁的《毛诗序》，戴德戴圣的《礼记》，韩婴的《韩诗外传》，王充的《论衡》，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白虎通义》，马融的《忠经》，郑玄的《天文七政论》《中侯》，延笃的《仁孝论》等，可谓是巨著纷呈，群星耀眼，经学成就巨大，开启了后世经学研究的先河。唐宋时期，文化繁荣，流派众多，群星灿烂。唐朝早期正是有唐太宗、唐玄宗的以孝治国，才会有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等不朽诗歌巨才。唐末正是有唐宪宗这位“中兴之主”和唐宣宗的“大中之治”，才出现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孟郊、元稹等杰出人物。进入宋朝，从宋太祖到宋仁宗、宋英宗都大力倡导儒学，推崇孝治，宋词迅速崛起，散文走向鼎盛，可谓是佳作天成，群星荟萃，不仅先后编成了《资治通鉴》《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多部奇书，而且接连出现了像寇准、范仲淹、欧阳修、晏殊、晏几道、司马光、苏轼、王安石、柳永、秦观等一大批杰出巨匠，同时在思想界形成的“理学”派别，涌现出程颢、程颐、张载、周敦颐、邵雍等一批前驱人物，又有南宋朱熹、陆九渊等大儒接力，形成影响深远的“程朱理学”，以至到明朝湛若水、王阳明、朱得之等人完善“理学”而形成的“心学”派别，都是儒家思想的传承、孝道精髓的结晶和明君以孝作为国本的丰硕成果。

基于先父两部著作的启发，又从前辈学术成果中汲取养分，再到对帝王之孝的深刻感受和赞美，经过多年的努力，在众多有志的年轻学友的帮助下，这部《中国帝王孝纪》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掩稿而思，也着实令我惶恐。一是由于自己历史知识的